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吗？——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考察

作者：杨沈龙 郭永玉 胡小勇 舒首立 李静

##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请作者修改和充实以下几个问题：

**意见 1：** 第一，关于系统公正与系统拥护的概念区分与解释问题。虽然文中阐释了为何将系统公正概念译为系统拥护，提到了正当化与支持程度等，但这同拥护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很难脱离原有理论中的概念。并且在文中 1.2 部分对高低阶层系统拥护的差异探究过程中，笔者论述过程中又重新提到了公平感，这又同本文通篇所使用的系统拥护存在出入。最好在文中对于两个概念的界定以及区分方面做出详尽的解释，做到概念的统一。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将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 一、为何将 *system justification* 译为“系统拥护”？

Kay 和 Jost (2003, 2014) 将 *system justification* 界定为个体维护、支持现存社会体系，并认为其公平、合理、正当的一种倾向，*system justification scale* (也即本研究的测量工具) 的编制也是遵此定义 (Kay & Jost, 2003)。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此含义最为符合的汉语词汇，而且其适用语境应该是在社会政治方面。立足于这两点，我们最终认为“拥护”一词最为贴切：《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对“拥护”一词的解释为“对领袖、党派、政策、措施等表示赞成并全力支持”，例句为“拥护党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2, p. 1567)。基于此解释，“拥护”一词的适用语境恰为社会政治情境；更重要的是，它“表示赞成并全力支持”的这一涵义也可以相对较好地对映“*system justification*”中的“认可正当性”和“支持系统”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将其译为“系统拥护”能够较好地保留其原意。

### 二、为何没有将“*justification*”译为“正当化”？它与“公平感”、“支持”又应如何区分？

我们未将“*justification*”译为“正当化”，一方面由于“正当化”在表述上不符合汉语习惯，词义相对费解。更主要的问题是，“正当化”所强调的是心理过程，而作为一个变量的系统拥护强调的是个体拥护系统的心理结果。这一点在 Kay 和 Jost (2003) 编制系统拥护量表时已有明确阐述 (Kay & Jost, 2003)。而且再结合本研究问题来看，不论是前人所做的同类研究 (e.g., Jost et al., 2003; Brandt, 2013a, 2013b) 还是本研究，要关注的都是作为一种心理结果的系统拥护程度与社会阶层之间关系，所以译为“正当化”并不合适。

“公平感”和“支持”两个概念与系统拥护的定义有一定重合。但是，系统拥护又不仅仅是公平感或者支持，它具有总体性、一般性，是个体一系列拥护系统的心理与行为的集合 (Jost & Hunyady, 2005)。Jost 等 (2014) 专门对此做过总结，他们强调系统拥护既有总体一般层面的测量 (Kay & Jost, 2003)，也有具体情境层面的表现，如经济满意度 (Jost & Thompson, 2000)、支持现有制度 (Jost et al., 2003) 以及公平感 (e.g., Kay, Jost, & Young, 2005) 等，所以应当将“公平感”和“支持”看作是系统拥护的具体表现而非其本身，它们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 1.2 部分通过引用公平感的研究，来作为系统拥护相关假设的佐证，我们认为这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综上两点,我们认为“系统拥护”这一翻译是能够很好地保留其原意,且区别于相关概念的。不过,本文原稿对于系统拥护和公平感的概念区分及其关系方面确实介绍得不够。因此结合了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对于 1.1 部分第一段(介绍系统拥护部分)、脚注 1(对翻译的解释)以及 1.2 部分第二段(提及公平感的研究部分)进行了扩写与修改,更详细地阐述了系统拥护这一概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以期能使文章在概念界定方面更为细致、严谨。再次感谢专家的这一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 Brandt, M. J. (2013a).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 765–785.
- Brandt, M. J. (2013b). Low status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business: A reanalysis of Brandt (2013). Available at SSRN 2275189.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2012).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6th)*.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Jost, J. T., & Hunyady, O. (2005).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260–265.
- Jost, J. T., Hawkins, C. B., Nosek, B. A., Hennes, E. P., Stern, C., Gosling, S. D., & Graham, J. (2014). Belief in a just God (and a just society): A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pective on religious ide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4*, 56–81.
- 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Sullivan, B. (2003).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3–36.
- Jost, J. T., & Thompson, E. P. (2000). Group-based dominance and opposition to equal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self-esteem, ethnocentrism, and social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 209–232.
- Kay, A. C., & Jost, J. T. (2003). Complementary justice: Effects of "poor but happy" and "poor but honest" stereotype exemplars o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implicit activation of the justice mo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23–837.
- Kay, A. C., & Jost, J. T. (2014).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motivational sci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s one of many "autonomous motivational struc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7*, 146–147.
- Kay, A. C., Jost, J. T., & Young, S. (2005). Victim derogation and victim enhancement as alternate routes to system jus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240–246.

**意见 2:** 关于统计结果分析方面的问题。通过表 2 和表 3 能够较好的验证文章提出的假设 1 的内容。但在表 3 中为何社会阶层变量的均值为 0。此外,关于文中提到,在以往研究中采用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合成的指标对社会阶层变量加以考量,此处的客观指标是否与文中国内研究者采用的指标研究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通过附录仅能看到社会职业类别的划定,并没有如家庭收入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指标。故文中对于合成的指标处理是否存在不妥之处。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 我们将从以下两方面来回答。

#### 一、研究二中社会阶层的均值为何为 0?

这里社会阶层的均值之所以为 0,是因为研究二所使用的社会阶层分数是由主观阶层的标准分数和客观阶层的标准分数相加合成的,故其均值为 0。很抱歉我们在文中并未特别

强调这一点，给理解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在修改稿中，我们对于 3.1.2 部分第一段(介绍研究二中社会阶层测量的部分)进行了修改，以期能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

## 二、研究二中为何仅用职业来作为客观社会阶层的指标？

诚如专家所说，研究二确实是只采用了陆学艺(2002)编制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政治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依据划分的“十大社会阶层”测量工具(参照国内学界习惯，下文简称其为“十大阶层”)来反映客观社会阶层，而没有采用收入指标。对于这一做法我们的考虑如下。

**第一，“十大阶层”这一划分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客观社会阶层的定义是个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掌控情况(e.g., Kraus et al., 2012; 李强, 2012)。而“十大阶层”这一划分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中国社会三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分布状况，即政治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如若测量收入水平只能反映经济资源占有情况。因此，至少该工具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是更为扎实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关注该工具的具体内容是否能够较好地涵盖上述三点资源(见第二点)。

**第二，从现实背景上来看，“十大阶层”的划分确实能比较好地涵盖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格局。**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宏观动态过程。1978 年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学界所谓的“双重转型”(e.g., 刘平, 2007; 厉以宁, 2014)——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对于社会分层的推动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分工分化(出现了技术型与非技术型等不同分工)、管理分化(科层组织扩张，管理层次增多等)、生产关系分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受雇佣者之间的分化)和制度分割(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化)，这四种分化机制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几种社会关系，而每个个体在这些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也即其客观社会阶层水平(e.g., 李路路, 2004; 李新芝, 2007; 郑杭生, 2000)。那么为什么说“十大阶层”的划分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一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处于这一测量工具中偏向优势阶层的一端，他们就越明显地在上述四种分化机制中占到了有利的位置，在分工分化上他们多属于专业技术型，管理分化上他们多位于权力上层，生产关系分化上他们可以更多占有或支配生产资料，制度分割上他们更多位于体制内，总而言之他们占据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反之，越是位于这一测量工具中偏向弱势阶层的一端，在四种分化关系中就越处于下端，只占有很少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因此可以说，“十大阶层”的划定基本能够做到以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中各阶层的资源占有结构。

**第三，通过比较现有测量方式，本研究选用“十大阶层”作为研究工具也是相对合理的。**学界对于客观阶层的测量无非三种方式，即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我们这里仅针对于中国样本，分析三种测量方式的适用性。首先争议最大的是受教育程度，这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真实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的对应关系最为模糊(e.g.,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钱民辉, 2004)。其次再来分析以家庭收入作为客观阶层的测量方式，虽然这种测量具有较好的表面效率，但是也受到大量质疑，这主要由于以下四点。一是收入隐私程度高，特别是当调查学生的父母收入时，更难以获得真实情况(e.g., 任春荣, 2010)；二是对于很多职业而言，其收入可能并不稳定，有时收入较高有时收入较低，难以客观衡量(钟景迅, 黄斌, 2012)；三是当今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有多重来源，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可能有各类单位福利、投资收入、灰色收入等等，被调查者通常不会将这些方面真实报告(黄小瑞, 2014)；四是收入受地域影响较大，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一线城市和在三四线城市完全不可等量齐观(李静, 2014)。另外还有研究者建议改用家庭资产来代替收入测量，但家庭资产与收入相比不仅测量成本更高，而且同样存在着隐私性强、学生难以真正了解家庭情况、地域差距悬殊(如同样一套房产在不同城

市差别迥异)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种弊端,已经有很多学者明确建议取消这方面的指标测量,以免干扰研究结果(e.g., 师保国, 申继亮, 2007; 孙中欣, 1999)。

说完了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我们再来看本研究所使用的职业指标。相比于前两种,职业的测量可以得到相对真实、客观的数据,学生对父母职业有明确的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职业指标能够较好地涵盖和反映个体收入和文化水平,因此很多社会学研究者都明确建议用职业来代表阶层,例如李强和王昊(2014, p. 175)强调“职业不仅直接决定其经济收入,也能反映受教育的水平,乃至享有的社会声望和地位”,钟景迅和黄斌(2012, p. 33)强调“职业地位可以说是代表个人社会阶层的最佳单一指标”等等。而如若采用职业指标,从国内现有工具来看,“十大阶层”至少是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很多学者都对于其权威性和可信性有明确的强调(e.g.,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李晓壮, 2016; 任春荣, 2010),而且像心理学(e.g., 侯静, 陈会昌, 陈欣银, 2008; 胡小勇等, 2016; 汪新建, 程婕婷, 2015)、教育学(e.g., 董美英, 程家福, 2016; 叶晓阳, 丁延庆, 2015; 沈红, 2016)、体育学(e.g., 马德浩, 2015; 赵胜国, 金涛, 邵崇禧, 2015)等国内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次将其作为考察社会阶层的工具,显示了其广泛的适用性。

**第四,从本土化研究视角来看,“十大阶层”的划分也能够比较好地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将个体职业作为社会阶层标准,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早在东周时期,士农工商的标准就已经非常清晰而明确了,所谓“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管子·小匡》),这一阶层划分与排序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通行。而到了元朝时则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同样是通过职业来划定社会阶层。除了这一文化传统之外,“十大阶层”这一工具对于职业的排序也能体现出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实,例如在此量表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被定位为最上层,但在国外主流的用职业来表征社会阶层的测量工具中情况却并不如此(e.g., Ganzeboom, De Graaf, & Treiman, 1992; Treiman, 1977),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在此工具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若采用国外职业问卷或者其他阶层指标,这一点就无法得到突显。

**第五,尽管“十大阶层”这一标准也有瑕疵,但不会给本研究造成太大影响。**对于“十大阶层”这一标准可能存在的不足,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对于阶层的排序是否能做到上一阶层必然大于下一阶层。对此我们有如下三点考虑。首先根据客观阶层的定义,区分社会阶层的关键是个体占有和掌控的社会资源(e.g., Kraus et al., 2012; 李强, 2012),而且在中国社会,政治资源的重要性往往要大于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是“十大阶层”划分与排序的根本基础。只要遵循这一根本标准来分析,就会发现“十大阶层”的排序基本客观公允,每一个上层与其下层相比,在资源占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或者是在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方面显著强于其下层。其次,尽管我们也承认“十大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着某些下层个体强于某些上层个体的情况,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于阶层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所致,而且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不管我们经过多么精密的调研,建立多么细致的划分,这一情况都难以避免。以收入的测量为例,研究者同样无法保证相对低收入者的社会资源必然少于相对高收入者。因此在比较不同阶层时,学者们普遍更关注的是常例(群体)而非特例(个体),从这一角度来讲,“十大阶层”划分能够保证一类与一类之间在总体资源占有格局上是依次递减的。最后,不论本研究还是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其他研究,其目的都只是考察全社会低阶层与高阶层的总体差异趋势(e.g., Kraus et al., 2012; Kraus & Stephen, 2012),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大阶层”这一工具也是能够满足这一目的的,它可以勾勒出我国社会在总体上从低到高的社会结构状况。

综合以上五点,我们认为研究二采用“十大阶层”这一工具来反映中国社会下个体的客观阶层水平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在此基础上与主观阶层成分加以标准化合成,很好地体现了“客观资源占有与主观地位感知”的社会阶层定义(Kraus et al., 2012)。尽管还难以避免一些细节上的瑕疵,但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测量手段的基础上,当前这种做法已经可以相对比较准确地描绘阶层分化了,而且能够满足本研究考察高低阶层差异的目的。

当然,基于社会阶层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笔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也不排除更合理的测量方式存在的可能。因此如果专家认为我们的上述考虑还有欠缺,或者认为此测量方式还有改进的空间,我们也非常乐于听取专家的进一步建议,完善甚至补做研究。以上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全部考虑,在此对专家的耐心阅读致以我们诚挚的感谢!

#### 参考文献:

- Dong, M. Y., & Cheng, J. F. (2016). Who are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policy of bonus point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A study based on the national sample survey data of colleges in 2012.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7, 14–21.
- [董美英, 程家福. (2016). 谁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者——基于 2012 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 *高等教育研究*, 37, 14–21.]
- Ganzeboom, H. B. G., Graaf, P. M. D., & Treiman, D. J.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1–56.
- Hou, J., Chen, H. C., & Chen, X. Y.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from 2 to 7 years of ag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 701–708.
- [侯静, 陈会昌, 陈欣银. (2008). 儿童 2~7 岁行为抑制性的发展. *心理学报*, 40, 701–708.]
- Hu, X. Y., Guo, Y. Y., Li, J., & Yang, S. L. (2016).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and goal attainment: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ir mechanism.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8, 271–289.
-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 271–289.]
- Huang, X. R. (2014). Measurement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Global Education*, (12), 82–92.
- [黄小瑞. (2014).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及合成方法. *全球教育展望*, (12), 82–92.]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 Li, J. (2014). *Study on the Tendency of Attribution 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李静. (2014).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心理归因研究*.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Li, L. L. (2004).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Mechan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1), 11–18.
- [李路路. (2004). 社会分层结构:机制变革与阶层相互关系. *江苏社会科学*, (1), 11–18.]
- Li, L. L., Qin, G. Q., & Chen, J. W. (2004).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ity-based stratum system: An analysis based on work situ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6), 46–76.
-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 (6), 46–76.]
- Li, Q. (2014).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pace.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 1–9.
- [李强. (2012). 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1–9.]
- Li, Q., Wang, H. (2014). Four world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 Front*, (9), 174–187.
- [李强, 王昊. (2014).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社会科学战线*, (9), 174–187.]

- Li, X. Z. (2007). O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upon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4, 14–19.
- [李新芝. (2007).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 14–19.]
- Li, X. Z. (2016). The change and optimization of Beijing social class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3), 88–96.
- [李晓壮. (2016). 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及优化. *北京社会科学*, (3), 88–96.]
- Li, Y. (2014). *Chinese Economy in Dual Trans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厉以宁. (2014).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Liu, P. (2007). The new dualistic society: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104–117.
- [刘平. (2007). 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1), 104–117.]
- Lu, X. Y. (Ed.). (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lass research repor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陆学艺 (Ed.).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a, D. H. (2015). Research on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hina Sport Science*, 35, 3–11.
- [马德浩. (2015). 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对体育发展战略的影响. *体育科学*, 35, 3–11.]
- Qian, M. H. (2004). Does education really promot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aly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cience Front*, (4), 194–200.
- [钱民辉. (2004).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 (4), 194–200.]
- Ren, C. R. (2010). Measurement methodology on social economic status index of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6, 77–82.
- [任春荣. (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 77–82.]
- Shen, H. (2016). Status of University Faculty Development in China——Based on 2014 faculty surve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7, 37–46.
- [沈红. (2016). 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状况——基于“2014 中国大学教师调查”的分析. *高等教育研究*, 37, 37–46.]
- Shi, B. G., & Shen, J. L. (2007).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SES, intelligenc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creativity.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3, 30–34.
- [师保国, 申继亮. (200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3, 30–34.]
- Sun, Z. X. (1999).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y on academic failure. *Research on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1), 47–51.
- [孙中欣. (1999). 学业失败问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 47–51.]
- Treiman, 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ng, X. J., & Cheng, J. T. (2015). Approaches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143–149.
- [汪新建, 程婕婷. (2015).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本土研究路径.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43–149.]
- Ye, X. Y., & Ding, Y. Q. (2015). Expand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193–220.
- [叶晓阳, 丁延庆. (2015).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社会*, 35, 193–220.]
- Zhao, S. G., Jin, T., & Tai, C. X. (2015). Features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ports consumption by new citizen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 10–16.

[赵胜国, 金涛, 邵崇禧. (2015). 社会分层视角下中小城市新市民体育锻炼与消费特征分析. *中国体育科技*, (6), 10-16.]

Zheng, H. S. (2000).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a urban social stratum.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 3-6.

[郑杭生. (2002). 关于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划分的几个问题. *江苏社会科学*, (2), 3-6.]

Zhong, J. X., & Huang, B. (2012).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tudent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of academic burden. *Global Education*, (12), 31-39.

[钟景迅, 黄斌. (2012). 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测量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全球教育展望*, (12), 31-39.]

**意见 3:** 现实意义与价值的探讨相对于理论意义略显匮乏。对于研究结果的讨论与总结方面, 研究从理论方面较为充分地验证了假设中提到的中介效应模型, 以及模型中控制感的调节作用, 同时也在文中多次提到能够改善当前现状的重要因素就是控制感, 但文中对于如何提高低层级大学生的控制感以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的实际建议内容相对匮乏, 略有空中楼阁之感。提一些能落到实处的建议为佳。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前稿中我们确实没有进一步讨论如何提升控制感的问题。对此我们完全同意专家的意见, 补充此内容可以更好地体现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 我们在修改稿 4.3 部分讨论控制感的调节作用这一内容时, 从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两个角度着眼, 围绕着现有的实证研究证据, 补充讨论了这一内容, 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 以期能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再次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基于社会认知视角, 考察系统公正理论在低阶层大学生群体的适用性, 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 思路清晰, 设计规范。然提出以下问题与作者商榷: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设计等方面的肯定! 下面我们将根据专家的建议, 逐一进行说明与修改。

**意见 1:** 图 1 的研究框架中, 可以将假设 H1-H3 标在图上, 这样可读性更强。同时加个页码, 方便 reviewer。

**回应:** 感谢专家的指导建议! 我们已经按照此建议进行了修改, 见图 1 与正文页脚。

**意见 2:** 在 1.2 部分, 综述了“贫富归因”作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根据, 研究中是将其作为前因变量(社会阶层)与结果变量(系统拥护)的完全中介来对待的。我的一个疑惑是, 如果中介变量是“对于社会阶层高低的归因”, 那么“社会阶层->阶层归因->系统拥护”这里面的逻辑自然是无问题的。但研究中用的是“贫富归因”, 诚然贫富差距是社会阶层差异的一个重要标记, 但现实中, 阶层与贫富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尽管您在研究中验证了社会阶层->贫富归因->系统拥护的完全中介效果, 但如果将贫富归因换成别的能够体现社会阶层差异的归因(如成败归因, 权势大小归因)等, 是否也会发现类似的中介效应? 换言之, 贫富归因只是中介变量之一, 也许还有别的社会认知(中介)变量。本研究对此是如何考虑的?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贫富归因所起到的只是部分中介而非完全中介作用。表 2 和表 4 中回归方程的  $R^2$  并不高, 是否跟中介变量不全有关?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 一、本研究中贫富归因并非完全中介

首先很抱歉的是, 在前稿中我们对中介变量的表述也许存在不清晰之处, 在此请先允许我们做一点澄清。本研究并没有将贫富归因的中介作用视为完全中介, 本文一以贯之的观点是社会阶层影响系统拥护的机制可能很复杂, 起作用的因素可能不只一个, 在原稿的“不足

与展望”部分我们就明确写道“本研究更多的是借鉴了系统公正理论中最新提出的认知途径解释，但这并不代表社会认知是唯一起作用的机制”。由此可见，我们并非将贫富归因作为此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机制。当然，因为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社会认知途径的作用，故而在写作过程中确实对我们所假设的中介路径有较多的强调，易给人造成本研究只认为贫富归因在其中起作用的印象，我们对此深感抱歉，这需要我们在修改稿中进一步阐明。

其次，尽管本研究的两个研究数据都显示，在中介效应分析过程中  $c'$  (同时纳入社会阶层和贫富归因来预测系统拥护时，社会阶层对系统拥护的预测作用) 并不显著，但根据国内心理统计学者(温忠麟，叶宝娟, 2014) 较为新近的阐述，这并不能算是完全中介——虽然过去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中介效应是“完全中介”(James & Brett, 1984)，但通常这时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并没有接近 100%，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指出，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的区分是有问题的，过去所谓的“完全中介”根本无法排除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的存在。对此，国内外心理统计学者都已建议，应放弃完全中介的概念，将所有中介都看作是部分中介(Preacher & Hayes, 2008; 温忠麟，叶宝娟, 2014)。我们也完全同意这一建议，这不仅出于统计学方面的考虑，也是出于我们对于本研究问题的考虑(阶层与系统拥护关系的作用机制可能比较复杂，不存在单一中介机制能够完全解释其效应)。

## 二、为什么本文认为个体对贫富的归因是这其中一个是关键的中介机制，而没有选择诸如成就归因、阶层归因等其他社会认知变量？对此我们基于如下三点考虑。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本研究最主要的依据是 Hussak 和 Cimpian(2015)提出的系统拥护的认知途径解释，该观点所强调的形成系统拥护的认知基础正是对于社会经济差异(socioeconomic disparity)的认知，而非对于其他社会结果的认知，因此考察贫富归因的中介机制是最能吻合该理论观点的。

其次，本研究参照了过往相关领域的研究，虽然成就大小、阶层高低似乎比贫富更具有一般性意义，但因为成就、阶层这些属性对一般民众来说相对抽象，而贫富程度直观易懂，所以在很多研究中，当调查被试对阶层差异、社会不平等这类问题的认知时，研究者都会直接用贫富差异来代指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例如在调查民众对于阶层流动的预期时，研究者通常都会直接让被试考虑穷人财富增长和富人变得贫穷的可能性，而不会让被试去判断相对抽象的社会阶层变动问题(e.g., 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 Tan, 2015)，尽管后者可能更符合阶层流动的概念，但民众对此状况的感受显然不如前者来得直观。

最后，从现实生活来看，绝大多数人直接关心的往往并不是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层或者人生是否成功，而恰恰是自己如何能挣到钱、能挣到多少钱，也就是说人们对金钱和贫富问题的关切程度往往是最直接的，也是对于他们评价社会系统最为关键的。例如 Ng 和 Allen(2005)曾研究表明，在一系列可能影响个体社会公平感的预测因素中，预测力最强的就是个体对于贫富结果的归因。2015年“两会”期间，“人民网两会热点调查”曾询问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结果在 16 个备选项中，也是收入分配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具体到大学生，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也一直是其择业最看重的因素(李峰，柯峰，文鹏，2012; 阴国恩，戴斌荣，金东贤, 2000)。

因此综合上述考虑，我们认为用“贫富归因”这一概念最能抓住这一问题的关键，无论从理论依据、研究设计还是现实关切哪个角度来讲，将贫富归因作为本研究问题的中介机制均是合理的。

## 三、 $R^2$ 并不高，是否跟中介变量不全有关？

对于表 2 和表 4 中的  $R^2$ ，我们认为这不能完全体现出中介变量选取的合理与否。 $R^2$  代表的是回归方程中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郑昊敏，温忠麟，吴艳, 2011)，但中介变量关心的是在一个确定的自变量预测因变量的效应中，通过该中介变量这一间接路径所能解释的部分占总效应的比例(温忠麟，叶宝娟, 2014)。在本文的两个研究中，中介路径所占比例并



不算小,说明当我们考察阶层预测系统拥护这一效应时,将贫富归因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其预测效应,是有较好的解释力的。另外,表2和表4中 $R^2$ 并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很多统计学者(e.g., Ellis, 2010; Wainer & Robinson, 2003)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因变量(如本文关注的系统拥护)都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因此要在绝对意义上鉴别某单一因素的解释力是大是小,常常意义不大——有的因素可能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很大,但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很可能是 common sense, 其研究价值不一定大;相反有些因素也许对于这一因变量的预测效力不很大,但这种相对偏小的效应可能会间接造成重大的结果,特别是当小效应所涉及的人群范围比较广泛时,这种小效应也需引起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研究中选取贫富归因作为中介变量,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现实考虑还是数据结果方面,均有足够的依据。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在之前稿件中我们对于贫富归因所起到的作用这一问题,并没有特别确切地说明。因此结合专家的建议,我们在2.2.2部分报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时附加说明了贫富归因的中介作用并非完全中介,并且在4.4部分的讨论中也明确地再次强调了贫富归因并非是阶层预测系统拥护的唯一机制,以期能更清楚地阐明贫富归因在本问题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一建议!

#### 参考文献:

- Davidai, S., & Gilovich, T. (2015). Building a more mobile America—One income quintile at a tim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60–71.
- Ellis, P. D. (2010). *The essential guide to effect sizes: Statistical power, meta-analysi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ssak, L. J., & Cimpian, A. (2015).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 739–752.
- James, L. R., & Brett, J. M. (1984).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307–321.
- Kay, A. C., & Jost, J. T. (2014).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motivational sci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s one of many “autonomous motivational struc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7*, 146–147.
- Kraus, M. W., & Tan, J. J. (2015).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class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101–111.
- Li, F., Ke, F., & Wen, P. (2012).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differences of undergraduates' career expectations in China—The case of seven universities belo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Wuhan.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4)*, 21–29.
- [李峰, 柯峰, 文鹏. (2012). 大学生择业期望现状及差异性分析研究——以武汉市七所部属高校为例. *人口与发展, (4)*, 21–29.]
-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3*, 435–454.
-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 879–891.
- Wainer, H., & Robinson, D. H. (2003). Shaping up the practice of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2*, 22–30.
- Wen, Z. L., & Ye, B. J. (2014).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731–745.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 731–745.]
- Yin, G. E., Dai, B. R., & Jin, D. X. (2000).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occupations and occupational valu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metho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4), 38–43.

[阴国恩, 戴斌荣, 金东贤. (2000). 大学生职业选择和职业价值观的调查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4), 38–43.]

Zheng, H. M., Wen, Z. L., & Wu, Y. (2011). The Appropriate Effect Sizes and Their Calculation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1868–1878.

[郑昊敏, 温忠麟, 吴艳. (2011). 心理学常用效应量的选用与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19, 1868–1878.]

**意见 3:** 研究一中对于“控制感”的操纵有效性事先用了预实验来证明。为什么不在正式实验中对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预实验有效果不等于正式实验中就一定有效果。如果有足够的理由，应该更详细的说明。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研究一之所以用预实验来检验控制感的操纵效果而没有在正式实验中检验，这是遵循了过往研究中采用该范式的研究者们的建议(e.g., Shepherd, Kay, Landau, & Keefer, 2011)。Shepherd 等(2011)曾明确指出，如果在操纵了控制感之后，后面的实验流程时间较长，控制感操纵的效应会有所减弱，所以在控制感操纵之后应尽量少地安排测量项目。正因如此，对于操纵控制感有效性的检验，过往研究也是采取了引入预实验的办法(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 Laurin, 2008)。

当然我们也非常同意专家的建议，原稿在此处确实应该有更详细的说明，因此结合专家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一的 2.1.2 部分介绍控制感的实验操纵部分，用脚注的形式详细说明了设置预实验的理由，以期能更好地阐明本研究设计的细致考虑。

参考文献:

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 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18–35.

Shepherd, S., Kay, A. C., Landau, M. J., & Keefer, L. A. (2011). Evidence for the specificity of control motivations in worldview defense: Distinguishing compensatory control from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nd terror manage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949–958.

**意见 4:** 因变量“系统拥护”的测量，虽然用的是常用量表，但最好还是用一个“如”举个例题，并非所有读者都熟悉该量表。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已经遵循建议做了修改，见 2.1.2 部分介绍系统拥护测量的段落。

**意见 5:** 对于协变量可能存在的干扰本文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做法，当然是有根据的 (Becker et al., 2015; Spector & Brannick, 2011)。但这么做是否真的合适？毕竟不同于以往的惯例~~所引文献也主要是组织管理领域的，社会情境更复杂，涉及变量可能更多。拿本文来说，为何不考虑被试户籍（城市还是农村）这一统计变量对于本研究特别是研究二问卷调查研究的影响？不控制一些可能存在影响的协变量，似乎需要更充足的理由，不能在文中一两句就带过。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对于本研究中是否需要引入协变量这一问题，我们的考虑如下。

首先，协变量的加入是起到了净化变量关系的作用，还是反倒干扰了研究假设的论证，这要取决于研究目的(Spector & Brannick, 2011)。如果研究存在某种明确的理论考虑，就是要排除掉某个协变量的干扰，本质上关注的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偏相关或半偏相关关系，那么纳入协变量是合理的；但如果研究目的更关心的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简单相关，那么就不必引入控制变量(e.g., Bernerth & Aguinis, 2016; Breaugh, 2008; Carlson & Wu, 2012)。因为只

要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回归方程中的参数估计反映的已经不是原本自变量的效应了,而是拿掉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的部分之后,自变量残差的效应(Breaugh, 2008; Williams, Vandenberg, & Edwards, 2009)。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纷纷指出,加入控制变量不一定比不加入控制变量更为稳妥和保险,很多时候无目的地加入控制变量恰恰是有风险的(e.g., Becker et al., 2015; Bernerth & Aguinis, 2016; Spector & Brannick, 2011)。

因此,在考虑是否要纳入户籍(城乡)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要考察的到底是全体大学生(无论其来源于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阶层与其系统拥护程度的关系,还是在排除了城乡这一因素之后大学生家庭阶层水平与其系统拥护程度的关系(也即假定所有被试在同一城乡水平时,其阶层与系统拥护的关系)?对此,我们明确认为本研究更关注的是前者,无需排除城乡因素,因为即便高低阶层系统拥护的差异是由于高阶层来自城市而低阶层来自农村所致,也不干扰本研究的结果(本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形成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根源,如将阶层差异中城乡这一因素排除掉,那么所反映的就已不是真实的社会阶层概念了)。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做出这一判断所基于的统计学文献更多来源于管理学领域的期刊,但通过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这些统计原理并不只适用于管理情境,其推断都是基于基本的统计逻辑,因此无论对于管理学、社会学还是心理学,这些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综上,我们认为,在本研究中不应纳入统计控制,只有这样才最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不过我们也非常同意审稿专家的观点,认为我们在之前稿件中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过于简单。因此,结合专家意见,我们对于 2.1 部分的最后一段进行了扩写,详细地从统计原理和研究目的两方面说明了本研究不考虑统计控制的道理。再次感谢专家的这一建议!

#### 参考文献:

- Becker, T. E., Atinc, G., Breaugh, J. A., Carlson, K. D., Edwards, J. R., & Spector, P. E. (2015). Statistical control in correlational studies: 10 essential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ublished online: 25 SEP.
- Bernerth, J. B., & Aguinis, H. (2015). A critical review and best-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rol variable usage. *Personnel Psychology*. DOI: 10.1111/peps.12103.
- Breaugh, J. A. (2008).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in using statistical procedures to control for nuisance variables in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18, 282–293.
- Carlson, K. D., & Wu, J. (2012). The illusion of statistical control: Control variable practice in manage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5, 413–435.
- Spector, P. E., & Brannick, M. T. (2011). Methodological urban legends: The misuse of statistical control variabl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4, 287–305.
- Williams, L. J., Vandenberg, R. J., & Edwards, J. R. (2009).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 guide for improved analysi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3, 543–604.

**意见 6:** 研究二测量时“将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的指标分别做标准化处理然后相加,来反映被试的家庭阶层状况”。这个做法当然比只用其一更加全面。但客观阶层的划分以及赋值方法值得商榷。即便陆学艺本人在其专著中,对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划分,十大阶层与五大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是有交叉重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p9,图 1)。举个简单例子,经理阶层的地位并不必然比私有企业主阶层高(这一情况在当下更明显,毕竟陆的书已经是 13 年前的了)。因此,将“经理阶层”赋值为 2,将“私有企业主阶层”赋值为 3,似乎有些牵强。以此类推,整个客观阶层中除了较低的几个(服务业员工、工人、农民和无业者),其余阶层的赋值高低看起来不太科学,也不符合现实中各阶层对于自己的主观

感知。特别是跟主观阶层通过“阶梯量表”这一直观简便的测量工具来区分高低相比，客观阶层的赋值似有生搬硬套之嫌。在此基础上的主客观阶层量化后简单相加，易授人以柄。论文对此操作需有更能说服人的理由。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也感谢专家对于我们在研究中增加考虑客观阶层的这一思路予以了认可！不过对于客观社会阶层的测量，这本身在学界就存在很多争议。我们立足于本研究目的，最终选定陆学艺(2002)的这一测量工具(参照国内社会学界习惯，下文简称其为“十大阶层”)来反映客观社会阶层，具体来说，是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十大阶层”这一划分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客观社会阶层的定义是个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掌控情况(e.g., Kraus et al., 2012; 李强, 2012)，而“十大阶层”这一划分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中国社会三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分布状况，即政治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至少该工具在理论基础方面没有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关注该工具的具体内容是否能够较好地涵盖上述三点资源(见第二点)。

**第二，从现实背景上来看，“十大阶层”的划分确实能比较好地涵盖和反映现今社会中不同阶层的资源占有状况。**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宏观动态过程。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学界所谓的“双重转型”(e.g., 刘平, 2007; 厉以宁, 2014)——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对于社会分层的推动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分工分化(出现了技术型与非技术型等不同分工)、管理分化(科层组织扩张，管理层次增多等)、生产关系分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受雇佣者之间的分化)和制度分割(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化)，这四种分化机制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几种社会关系，而每个个体在这些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也即其客观社会阶层水平(e.g., 李路路, 2004; 李新芝, 2007; 郑杭生, 2000)。那么为什么说“十大阶层”的划分能够比较好地反映这一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处于这一测量工具中偏向优势阶层的一端，他们就越明显地在上述四种分化机制中占到了有利的位置，在分工分化上他们多属于专业技术型，管理分化上他们多位于权力上层，生产关系分化上他们可以更多占有或支配生产资料，制度分割上他们更多位于体制内，总而言之他们占据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反之，越是位于这一测量工具中偏向弱势阶层的一端，在四种分化关系中越处于下端，只占有很少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出于逻辑层次的考虑，请允许我们在本段先来讨论“十大阶层”从上层到下层总趋势的划分合理性，在下面的第五点中我们再具体探讨某一层和某一层之间的阶层高低问题)。因此可以说，“十大阶层”的划定确实基本做到了以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中各个阶层的资源占有结构。

**第三，通过比较现有测量方式，本研究选用“十大阶层”作为研究工具也是相对合理的。**学界对于客观阶层的测量无非三种方式，即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我们这里仅针对于中国样本，分析三种测量方式的适用性。首先争议最大的是受教育程度，这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真实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的对应关系最为模糊(e.g.,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钱民辉, 2004)。其次再来分析以家庭收入作为客观阶层的测量方式，虽然这种测量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但是也受到大量质疑，这主要由于以下四点。一是收入隐私程度高，特别是当调查学生的父母收入时，更难以获得真实情况(e.g., 任春荣, 2010)；二是对于很多职业而言，其收入可能并不稳定，有时收入较高有时收入较低，难以客观衡量(钟景迅, 黄斌, 2012)；三是当今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有多重来源，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可能有各类单位福利、投资收入、灰色收入等等，被调查者通常不会将这些方面真实报告(黄小瑞, 2014)；四是收入受地域影响较大，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一线城市和在三四线城市完全不可等量齐观(李静, 2014)。另外还有研究者建议改用家庭资产来代替收入测量，但家庭资产与收入相比不仅测量成本更高，而且同样存在着隐私性强、学生难以真正了解家庭情况、地域差距悬殊(如同样一套房产在不同城

市差别迥异)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种弊端,已经有很多学者明确建议取消这方面的指标测量,以免干扰研究结果(e.g., 师保国, 申继亮, 2007; 孙中欣, 1999)。

说完了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我们再来看本研究所使用的职业指标。相比于前两种,职业的测量可以得到相对真实、客观的数据,学生对父母职业有明确的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职业指标能够一定程度上涵盖和反映个体收入和文化水平,因此很多社会学研究者都明确建议以职业来代表阶层,例如李强和王昊(2014, p. 175)强调“职业不仅直接决定其经济收入,也能反映受教育的水平,乃至享有的社会声望和地位”,钟景迅和黄斌(2012, p. 33)强调“职业地位可以说是代表个人社会阶层的最佳单一指标”等等。而如若采用职业指标,从国内现有工具来看,“十大阶层”至少是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很多学者都对于其权威性和可信性有明确的强调(e.g.,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李晓壮, 2016; 任春荣, 2010),而且像心理学(e.g., 侯静, 陈会昌, 陈欣银, 2008; 胡小勇等, 2016; 汪新建, 程婕婷, 2015)、教育学(e.g., 董美英, 程家福, 2016; 叶晓阳, 丁延庆, 2015; 沈红, 2016)、体育学(e.g., 马德浩, 2015; 赵胜国, 金涛, 邵崇禧, 2015)等国内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次将其作为考察社会阶层的工具,显示了其广泛的适用性。

**第四,从本土化研究视角来看,“十大阶层”的划分这也能够比较好地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将个体职业作为社会阶层标准,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早在东周时期,士农工商的标准就已经非常清晰而明确了,所谓“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管子·小匡》),这一阶层划分与排序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通行。而到了元朝时则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同样是通过职业来划定社会阶层。除了这一文化传统之外,“十大阶层”这一工具对于职业的排序也能体现出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实,例如在此量表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被定位为最上层,但在国外主流的用职业来表征社会阶层的测量工具中情况却并不如此(e.g., Ganzeboom, De Graaf, & Treiman, 1992; Treiman, 1977),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在此工具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若采用国外职业问卷或者其他阶层指标,这一点就无法得到突显。

**第五,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十大阶层”这一标准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是否会给本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正如专家所说,就是它对于阶层的排序是否能做到上一阶层必然大于下一阶层,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对此我们有如下几点考虑。首先根据客观阶层的定义,区分社会阶层的关键是个体占有和掌控的社会资源(e.g., Kraus et al., 2012; 李强, 2012),而且在中国社会,政治资源的重要性往往要大于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是“十大阶层”划分与排序的根本基础。那么遵循这一基础标准来分析,“十大阶层”的排序基本客观公允。以经理人员和私有企业主的对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只在经济资源上略优于经理人员,但他们位于体制外,而且在劳动分工方面的属性也不能确定(不一定属于技术型分工也不一定掌握着企业核心技术资源),因此他们在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方面的占有很少;反观经理人员,他们中有一定比例位于体制内(包括垄断型央企、国企,而且这一比例并不低;特别是这些企业的高层,他们能够触及和参与支配的社会资源远非私有企业主可比),在特权、福利、薪酬等方面均有稳定保障,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具备高学历,在分工上也基本都属于技术型,有着优越的发展条件,所以尽管在经济资源上可能略逊于私有企业主,但在政治组织资源、文化资源上均明显优于私营企业主。总之当我们结合中国特有的体制来看待“十大阶层”,就会发现每一个上层与其下层相比,在资源占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或者是在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方面显著强于其下层。其次,我们也承认“十大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着某些下层个体强于某些上层个体的情况,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从整体上否定这一工具,因为这是由于阶层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所致,而且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不管我们经过多么精密的调研,建立多么细致的划分,这一情况都难以避免。例如用收入来反映客观

阶层，研究者同样无法保证相对低收入者的社会资源必然少于相对高收入者。因此在比较不同阶层时学者们普遍更关注的是常例(群体)而非特例(个体)，从这一角度来讲，“十大阶层”划分能够保证一类与一类之间在总体资源格局上是依次递减的。再次，虽然“十大阶层”的划分最早发表于2002年，但这并不代表该成果仅适用于十几年前的中国社会，因为直到该课题组发布的第四版调研报告中，其数据仍然显示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结构和排序并未发生变化，仅仅是人口比例有了改变(陆学艺，2013)。而且尽管也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些争议大多并非针对“十大阶层”本身及其排序，例如黄宗智(2008)认为陆学艺(2004)在对于十大阶层进行进一步归类时，陆所说的“中间阶层”与国外“中产阶级”概念存在混淆，还有学者(印子，2015)也持同样观点，但他们都并没有指出“十大阶层”本身的划分是有问题的。最后，不论本研究还是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其他研究，其目的都只是考察全社会低阶层与高阶层的总体差异趋势(e.g., Kraus et al., 2012; Kraus & Stephen, 2012)，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大阶层”这一工具是能够满足这一目的的，它可以勾勒出我国社会在总体上从低到高的社会资源占有状况。

综合以上五点，我们认为研究二采用“十大阶层”这一工具来反映中国社会下个体的客观阶层水平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在此基础上与主观阶层成分加以标准化合成，很好地体现了“客观资源占有与主观地位感知”的社会阶层定义(Kraus et al., 2012)。尽管还难以避免一些细节上的瑕疵，但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测量手段的基础上，当前这种做法已经可以相对比较准确地描绘阶层分化了，而且能够满足本研究考察高低阶层差异的目的。

当然，基于社会阶层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笔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也不排除更合理的测量方式存在的可能。因此如果专家认为我们的上述考虑还有欠缺，或者认为此测量方式还有改进的空间，我们也非常乐于听取专家的进一步建议，完善甚至补做研究。以上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全部考虑，在此对专家的耐心阅读致以我们诚挚的感谢！

#### 参考文献：

- Dong, M. Y., & Cheng, J. F. (2016). Who are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policy of bonus point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A study based on the national sample survey data of colleges in 2012.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7, 14–21.
- [董美英, 程家福. (2016). 谁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者——基于2012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 *高等教育研究*, 37, 14–21.]
- Ganzeboom, H. B. G., Graaf, P. M. D., & Treiman, D. J.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1–56.
- Hou, J., Chen, H. C., & Chen, X. Y.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from 2 to 7 years of ag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 701–708.
- [侯静, 陈会昌, 陈欣银. (2008). 儿童2~7岁行为抑制性的发展. *心理学报*, 40, 701–708.]
- Hu, X. Y., Guo, Y. Y., Li, J., & Yang, S. L. (2016).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and goal attainment: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ir mechanism.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8, 271–289.
-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 271–289.]
- Huang, X. R. (2014). Measurement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Global Education*, (12), 82–92.
- [黄小瑞. (2014).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及合成方法. *全球教育展望*, (12), 82–92.]
- Huang, Z. Z. (2008). *China's 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Law Press.
- [黄宗智. (2008).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 Li, J. (2014). *Study on the Tendency of Attribution 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李静. (2014).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心理归因研究.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Li, L. L. (2004).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Mechan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1), 11-18.
- [李路路. (2004). 社会分层结构:机制变革与阶层相互关系. *江苏社会科学*, (1), 11–18.]
- Li, L. L., Qin, G. Q., & Chen, J. W. (2004).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ity-based stratum system: An analysis based on work situ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6), 46–76.
- [李路路, 秦广强, 陈建伟. (2012). 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 (6), 46–76.]
- Li, Q. (2014).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pace.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 1–9.
- [李强. (2012). 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1–9.]
- Li, Q., Wang, H. (2014). Four world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 Front*, (9), 174–187.
- [李强, 王昊. (2014).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社会科学战线*, (9), 174–187.]
- Li, X. Z. (2007). O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upon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4, 14–19.
- [李新芝. (2007).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 14–19.]
- Li, X. Z. (2016). The change and optimization of Beijing social class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3), 88–96.
- [李晓壮. (2016). 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及优化. *北京社会科学*, (3), 88–96.]
- Li, Y. (2014). *Chinese Economy in Dual Trans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厉以宁. (2014).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Liu, P. (2007). The new dualistic society: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104–117.
- [刘平. (2007). 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1), 104–117.]
- Lu, X. Y. (Ed.). (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lass research repor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陆学艺 (Ed.).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Lu, X. Y. (Ed.). (2004). *Soci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陆学艺 (Ed.). (2004).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Lu, X. Y. (Ed.). (2013). *Society-buil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陆学艺 (Ed.). (2013).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a, D. H. (2015). Research on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hina Sport Science*, 35, 3–11.
- [马德浩. (2015). 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对体育发展战略的影响. *体育科学*, 35, 3–11.]
- Qian, M. H. (2004). Does education really promot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aly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cience Front*, (4), 194–200.
- [钱民辉. (2004).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 (4), 194–200.]
- Ren, C. R. (2010). Measurement methodology on social economic status index of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6, 77–82.
- [任春荣. (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 77–82.]

- Shen, H. (2016). Status of University Faculty Development in China—Based on 2014 faculty surve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7, 37–46.
- [沈红. (2016). 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状况——基于“2014 中国大学教师调查”的分析. *高等教育研究*, 37, 37–46.]
- Shi, B. G., & Shen, J. L. (2007).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SES, intelligenc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creativity.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3, 30–34.
- [师保国, 申继亮. (200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3, 30–34.]
- Sun, Z. X. (1999).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y on academic failure. *Research on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1), 47–51.
- [孙中欣. (1999). 学业失败问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 47–51.]
- Treiman, 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ng, X. J., & Cheng, J. T. (2015). Approaches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143–149.
- [汪新建, 程婕婷. (2015).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本土研究路径.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43–149.]
- Ye, X. Y., & Ding, Y. Q. (2015). Expand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193–220.
- [叶晓阳, 丁延庆. (2015).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社会*, 35, 193–220.]
- Yin, Z. (2015). Segmental incorpora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class foundation for grassroot governance—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ongzhen 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 97–106.
- [印子. (2015).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97–106.]
- Zhao, S. G., Jin, T., & Tai, C. X. (2015). Features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ports consumption by new citizen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 10–16.
- [赵胜国, 金涛, 邵崇禧. (2015). 社会分层视角下中小城市新市民体育锻炼与消费特征分析. *中国体育科技*, (6), 10–16.]
- Zheng, H. S. (2000).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a urban social stratum.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 3–6.
- [郑杭生. (2002). 关于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划分的几个问题. *江苏社会科学*, (2), 3–6.]
- Zhong, J. X., & Huang, B. (2012).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tudent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of academic burden. *Global Education*, (12), 31–39.
- [钟景迅, 黄斌. (2012). 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测量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全球教育展望*, (12), 31–39.]

**意见 7:** 研究一和研究二在“结果”之后缺乏讨论部分，形式上看起来不够完整（尽管最后有合起来的总讨论）。或者可以将两个研究各自的结果部分变成“结果与讨论”。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已经遵循建议做了修改，增加了 2.3 和 3.3 两个部分的分讨论。

**意见 8:** 本文聚焦的是大学生群体，得到“低阶层大学生的系统拥护水平显著低于高阶层大学生”这一跟系统公正理论不太相符的结论。但大学生群体有他的特殊性，其中之一表现在他们尚无踏入社会，对于系统还不存在明显的权力依附的关系。而这一点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社会的认知及行为。van der Toorn 和 Jost（2015）发在 PP 上的最新研究中证实了无权感（sense of powerlessness）或结果依赖性（output dependence）恰是底层弱势群体更加支持系统的原因。特别的，他们的第四个研究还涉及到了弱势群体对于财富分配的态度，我想可供本文在讨论中加以引用（另外他们的文章也回应了 Brandt's(2013)对系统公正理论的质疑）。



详情请见：Toorn, J., Feinberg, M., Jost, J. T., Kay, A. C., Tyler, T. R., Willer, R., & Wilmuth, C. (2015). 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fosters system justif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 hierarchy, and govern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36(1), 93-110.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对于 van der Toorn 等(2015)的这篇文献，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也考虑过引用，只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五个研究均没有直接关注社会阶层地位与系统拥护的关系（仅在研究 1 和研究 2 中将社会阶层作为协变量），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未引用这篇文献。但在阅读了专家提出的专业性修改意见之后，我们完全同意专家的上述建议，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讨论，使得本文能够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阐述阶层与系统拥护的关系，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具体来说，对于 van der Toorn 等(2015)这篇文献与本文的关系，我们有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我们之所以在最初投稿稿件中未引用这篇文献，主要基于研究内容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出身阶层，虽然从经验上来说无权感和低阶层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在理论上，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强调阶层与权力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e.g., Anderson, John, & Keltner, 2011; Kraus & Stephens, 2012; 云祥, 李小平, 2014)。再从数据来看，就以 van der Toorn 等(2015)的研究 2 为例，作者也明确地写道权力感与阶层的相关只是“fairly modest”。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本研究与 van der Toorn 等(2015)关注的问题并不相同。

第二，van der Toorn 等(2015)在文章中虽然也提到了阶层与系统拥护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强调他们的研究可以支持 Jost 等(2003)的结论或反驳 Brandt(2013)的结论。正如专家所说，他们是对 Brandt(2013)做了一种“回应”，他们所强调的，是要剥离权力感与阶层地位在概念上的混淆，单纯考察无权力感对系统拥护的影响作用，并且指出过往阶层预测系统拥护的结果之所以存在分歧，可能就是因为研究者混杂了权力和阶层的概念(p. 96)。在文章的讨论部分，van der Toorn 等(2015)再次强调其结论仅仅是权力感对系统拥护的作用，而对于阶层地位与系统拥护的关系究竟如何，尚需做更多的探究(“future studies would do well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being in an objective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leads to system justification”, p. 107)。因此从结果上来说，本研究与 van der Toorn 等(2015)的研究也并不冲突。

第三，尽管从研究本身来看，本研究与 van der Toorn 等(2015)的研究在研究问题和所得结论上既不相同也不冲突，但又不可否认，本研究确实与 van der Toorn 等(2015)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同意专家的意见，认为在本文中不引用该研究是不合适的。正如专家所说，本研究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而对于低阶层大学生，可能在无权感与系统依赖这一问题上与低阶层社会人士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本文虽未直接提到这一观点，但总体思路与专家的这一建议是完全吻合的：本文一再强调，应将所谓“低阶层”这一概念细化，考察具体的低阶层群体的系统拥护及其心理机制；特别是在 4.1 和 4.4 两部分都明确指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低阶层大学生，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推广研究结论时要更多考虑不同的阶层群体。

因此，结合专家的建议以及本研究总体逻辑思路，我们对 4.1 部分和 4.4 部分的讨论内容进行了扩展，通过引用 van der Toorn 等(2015)的研究，更详细地说明了具体的被试群体在本问题中的作用，并讨论了“低阶层是否更拥护系统”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更全面而深入地揭示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 Anderson, C., John, O. P., & Keltner, D. (2011).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 313–344.
- Brandt, M. J. (2013).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 765–785.

- 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Sullivan, B. (2003).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3–36.
-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 642–656.
- Yun, X., & Li, X. (2014). Nonconscious priming of feelings of power: An study on methods.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2*, 315–320.
- [云祥, 李小平. (2014). 权力感的无意识启动: 方法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12*, 315–320.]
- 

## 第二轮

**外审专家意见:** 作者认真修改了稿件, 并且进行了很好地回复。我没有进一步问题了, 建议发表。

**编委专家意见:** 文章探讨了中国情景下, 社会阶层、归因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 作者在考察归因的中介作用的同时还探讨了其作用的边界调节, 即控制感的调节作用。两个研究设计合理, 分析得当, 结果合理。经过专家的两轮评审, 文章质量有较大提高, 基本达到发表要求。但是依然还有一些问题。

**回应:** 感谢专家对本文给予的肯定以及提出的宝贵建议! 下面我们将根据专家的意见, 逐一进行修改与说明, 同时在文中对于主要修改部分用蓝色字体予以标注。

**意见 1:** 对于 system justification 的翻译不太妥当, 经过咨询有关关键, 建议翻译为: 系统合理化。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

经过认真考虑, 我们同意并采纳专家的建议, 已将“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改译为“系统合理化理论”, 将作为一个变量(本研究因变量)的“system justification”译为“系统合理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因为这两个名词在文中出现了很多次, 而且每一处的改法都一致, 所以在正文中没有将此类改动标注为蓝色字体, 以避免相同信息的过多重复)。

在此基础上, 我们对与此相关的一些表述也做了相应调整, 这主要是针对作为本研究因变量的“系统合理化”而言的。如将原题目中的“更拥护系统”修改为“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 以求更好地突显这一变量。不过在有些情况下, 作为一个结果变量, “系统合理化”一词不大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所以考虑到系统合理化的定义是个体维护、支持现存社会体系并认为其公平、合理、正当的一种倾向(Kay & Jost, 2003), 因此我们在某些语境中会使用诸如“更认为社会系统是合理的”、“更支持社会系统”这样的说法来代表“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这一含义。当然这样表述是符合系统合理化的定义的, 而且这也是仿照了该领域权威文献(e.g., Brandt, 2013; Hussak & Cimpian, 2015; Kay & Jost, 2003)的惯常表述方式。例如 Kay 和 Jost(2003)在编制系统合理化量表(也是本研究所用测量工具)时, 就多次用诸如“support for the system”(p. 825)、“perceptions that the status quo is fair, legitimate, and justifiable”(p. 827)这样的说法来代指“system justification”。具体改动见题目、摘要、引言部分第二段、1.1 部分、4.1 部分。

参考文献:

- Brandt, M. J. (2013).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 765–785.
- Hussak, L. J., & Cimpian, A. (2015).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 739–752.
- Kay, A. C., & Jost, J. T. (2003). Complementary justice: Effects of "poor but happy" and "poor but honest" stereotype exemplars o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implicit activation of the justice mo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23–837.

**意见 2:** 文章立意不够高，现在局限在大学生的范围内，建议不要过于突出大学生，就当成一般性的社会阶层对系统合理化的影响。注意：世界范围内 95% 的心理学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被试，但是极少说自己的研究只是针对大学生。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确如专家所说，很多心理学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被试来揭示适用于更广泛群体的心理行为规律。社会阶层心理学(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例外，以出身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作为被试来反映社会阶层的效应，是研究中常用的做法(e.g., Anderson, Kraus, Galinsky, & Keltner, 2012; Na & Chen, 2016; Stephens, Fryberg, Markus, Johnson, & Covarrubias, 2012)。而且从现有研究来看，出身于高(低)阶层家庭的学生所具备的很多心理特点与已经步入社会的高(低)阶层者并无明显差别(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因此，我们同意专家的修改建议，做了如下修改。第一，将文中“低阶层大学生”、“高阶层大学生”的提法统一改为“低阶层者”、“高阶层者”(因为这两个名词在文中出现了很多次，而且每一处的改法都一致，所以在正文中没有将此类改动标注为蓝色字体，以避免相同信息的过多重复)。第二，对于引言和讨论中原本提及大学生的一些表述做了改动，避免过多地突出和强调大学生群体，见引言部分第一段和 4.1 部分。第三，毕竟研究结果是基于大学生的样本，而修改稿中将研究立意扩展到一般性的社会阶层，因此在 4.4 部分“不足与展望”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了本研究样本的局限性问題。

参考文献:

- Anderson, C., Kraus, M. W., Galinsky, A. D., & Keltner, D. (2012). The local-ladder effect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764–771.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 Na, J., & Chan, M. Y. (2016).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lower social-class enhances response inhibi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0*, 242–246.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Johnson, C. S., & Covarrubias, R. (2012).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1178–1197.

**意见 3:** 研究一采用实验处理来对权力感进行操纵，研究二基于个体本有的权力感差异进行探讨。二者的差别不是因为研究采用问卷法，因为问卷法和实验处理不是相对的两个平行概念。问卷只是数据采集的方法，实验可以用，非实验也可以用。研究采用的实际上相关的研究方法，相关的方法是基于个体差异，而实验的方法是基于处理导致的群体差异（实验组和对照组）。因此研究二探讨的是阶层的个体差异是否和系统合理化的个体化差异相关。建议把有关术语进行合理修改。

**回应:** 感谢专家的仔细审读和宝贵建议！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对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调整。第

一，将研究二的研究方法表述为“相关法”，而不再是前稿所说的“问卷法”。第二，不再说研究二与研究一的差别在于采用了问卷法，而只强调研究二与研究一的不同在于样本来源、样本量，以及对核心变量的操作性定义方面。见正文引言部分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一段和第3部分第一段。

---

### 第三轮

#### 主编意见

The article is 13000+ words (for main content only). Pls. cut back 1000-2000 words. There are 100 references. Definitely remove 40 – 50 references. This is not a review article, we should keep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pdated references. Not put down all the books/articles you have photocopied. That is a sign of low quality to experienced researchers. Don't copy titles of work from your book shelf to the reference list. Other recommendations in revision mode. The \*\*, \*\*\* meaning disappear in some of the tables.

Response: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valuable advice!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ions, we have cut back 1400 words and removed many unnecessary references. Now, there are only 55 references left and 60 percent of them are recently published (after 2012). In addition, the English title and abstract have been revise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sterisks has been illustrated in table 2, 3 and 4.